

广州文史资料

(选 辑)

第 二 十 四 辑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资料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H100/17
广州文史资料

(选 辑)

第二十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1年12月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 印张

1981年12月 印数1—8,000

书号1111·84 定价0.79元

目 录

广州左联杂忆..... 杜 埃 (1)

敌后四年——在广州沦陷区的斗争回顾
..... 何君侠 (14)

我所知道的华南交通总站红色交通线情况
..... 饶卫华 (28)

龙川、和平两县建党记..... 麦 任 (42)

忆红十二军三攻大埔..... 余仲琪 (49)

红六军两个团在东江各县战斗忆述
..... 益 奋 (58)

抗战救亡实践社活动情况的回忆..... 肖汎波 (70)

中山大学五·卅一反饥饿、反迫害、反

内战运动忆述..... 李惠芳 (83)

忆正果之战..... 黄植虞 (97)

附：在老虎石顶建立抗日阵亡烈士墓 及黄沙飞坳建立抗日烈士纪念亭的回忆 ✓	
.....	王国祥 (102)
抗战期间增城县梅都自卫大队史料.....	陈冠中 (105)
抗战期间香港—南雄航空线通航始末...	黄焕元 (113)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	郭伟波 (118)
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肃奸专员办事处与广 东肃奸委员会.....	何崇校 (129)
回忆钟荣光校长.....	廖奉灵 (150)
旧中国广东的两间体育学校	向 勤 (154)
梅县足球运动史话.....	李次民 (164)
琼花忆语.....	梁松生 邓金祥 (177)
广州鸡鹅鸭苗行业史话	
.....	陈炳镇忆述，黄曦晖执笔 (222)
回忆国民党第一次的恩亲会	曾时润 (243)

广 州 左 联 杂 忆

杜 埃

广州左联成立之前，鲁迅的旗帜早在南方青年心坎上飘扬，上海左联通过各种文艺刊物特别是鲁迅他那叱咤风云的战斗杂文，就如茫茫黑夜的明灯，对广州左倾青年文艺爱好者起了哺育、鼓舞、进军的强有力作用。那时的广州已从大革命时期的中心变为反革命残暴统治的粤海堡垒，继“四·一五”大屠杀到“广州起义”的失败，无数工农群众、共产党员、革命教师、青年学生受到惨杀、监禁和迫害，广州地区革命已由高潮转入低潮。由于阶级敌人有了几次镇压革命的血腥经验，白色恐怖在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完整的统治机构和豢养一批嗅觉特灵的走狗、侦探。革命虽一再受到挫折，反动统治那么残酷，但革命并没停止，地下的火种正在燃烧，有志之士坚韧不拔，一批一批的青年在革命低潮中踏上斗争的道路，许多左倾知识分子追求光明，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黑夜中找寻党。这就是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当时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的深入和城市文化革命的深入。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对

左翼文化进行无休止的“围剿”，结果是左翼文化、文艺越来越深入发展。上海出版的左翼书刊禁了又出，出了又禁，再禁，变个刊名再出。这些左翼刊物吸引了众多读者，上海左联、社联、剧联对广州的革命文化、文艺活动在思想上、行动上起着历史上不可磨灭的领导、推动作用。一九三一年上海左联的李伟森、赵柔石、胡也频、徐殷夫、冯铿五位作家惨遭杀害的噩耗传来，这里的左翼青年无限悲愤，“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许多人从鲁迅为牺牲者所写的诗文中，吸取了战斗力量。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推进下，当时广州成立过以欧阳山、草明、易巩等为主要骨干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和以温流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会广州分会”。描写产业工人题材的欧阳山的中篇小说《单眼虎》和草明的《缙丝女失身记》以及皮凡的中篇小说《列车上的尸首》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约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那个时候，地下读书会，自发的地下刊物，如雨后春笋。经常发生逮捕事件和追查跟踪，欧阳山、草明离广州到上海参加左联后，“广州普罗作家同盟”活动暂告一段落。一九三三年通过中山大学何思敬教授介绍赖寅仿到上海接上了“社会科学联盟”的关系，而何干之（谭秀峰，国民大学教授）也怀着这一心情希望找着党，跑到上海联系，后来才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接上了关系，此后才把一九三二年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女子师范和市一中学等校先后组织起来的读书会发展成为“广州左翼文

化总同盟”，在“文总”领导下建立了社会科学联盟广州分盟、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戏剧工作者联盟广州分盟。

“文总”的主要负责人为何干之和谭国标、温盛刚，后来又增加了连贯、石辟澜同志。

那时留在广州成名作家不多，进步青年作者有一批。那时我廿一岁，是一个小组成员，局限性大，全面情况不了解。我所知道的广州左联的负责人之一是个姓金的（也可能是假姓，那时环境恶劣，很多人都用假姓名），他有着颇长身材，穿长衫，戴眼镜，文质彬彬；他几次代表广州左联到我们小组来参加秘密会议。当年虽不是党的组织（因为受到几次严重破坏，已经几年来没有了党组织，大家都在找党，有时甚至暗暗猜想某人就是党员或党派来的代表），但异常隐蔽，纪律很严，不敢过问这个姓金的名字，也无必要知道他的职业和地址。按一般原则，上级可以下到小组，下级没有必要知道上级住址。后来那个姓金的同志不来了，小组就由何绍群同志当组长（此同志于太平洋战争中失踪），小组与上级的联系也由他负责。“社联”盟员多为中大學生，凌伯骥、江穆（江新觉）负责“社联”宣传工作。“剧联”的主要骨干是胡春冰、连贯（学史）、袁文殊、和陈卓遒，阵地是中山大学的“抗日剧社”。

广州左联及左联成立之前和左联停止活动之后的主要情况，可以分为下列三方面：

一、开展读书会活动。这是左翼群众外围组织。读书会

内容分为几项：讨论国内外形势，密切注视蒋介石刽子手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日寇侵华引起的民族危机；其次是阅读、讨论左翼书刊，当时上海“水沫书店”、“明日书店”、“生活书店”、“现代书店”和其他进步出版单位出了许多革命书籍，如冯雪峰译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卡尔斯的文艺论著、鲁迅译的苏联文艺政策文集；郭沫若（麦克昂）译的美国工人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石油大王》；鲁迅译的《毁灭》、《铁流》；曹靖华译的《铁流》；此外还有反映苏联内战时期及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翻译小说如《士敏土》、《一周间》、《铁甲列车》、《被开垦的处女地》、《贫农组合》、《布罗斯基》等等和茅盾的《子夜》、《春蚕》、《清明前后》；日本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蒋光慈（光赤）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冲出云围的月亮》；华汉（阳翰笙）的三部曲和肖军的《八月的乡村》；丁玲的《水》；陈荒煤的《长江上》和肖红的《生死场》等等。以及上海出版的许多左翼文艺刊物和《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化了许多笔名的鲁迅杂文。文艺学习外，还讨论宣传工作和发展组织的工作。那时受关门主义影响，只在左倾份子中开展组织工作，串连活动多在可靠的同学、同乡、亲友中进行。此外，还有以学习“世界语”为主的读书小组。

二、宣传活动。第一是出版刊物。前面提到广州左联成立之前，一九三二年秋广州出版了匕首式的综合性秘密刊物

《火花》。《火花》出版的背景是这样的：“九一八”以后，广州青年抗日救亡的呼声沸腾起来了，“一二八”以后广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正如全国一样，在当时中山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的金昌华、曾生（曾振声）、杨康华（虞焕章）等人率领下，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抗战救亡，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反动派的南霸天陈济棠军阀则利用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和胡汉民派肖佛成、古应芬等所谓元老，在广东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西南执行部。这些反动头目在西南成立党政机构，名义上服从伪中央，实际上是割据南方，和蒋贼相对抗。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和地方军阀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当时这些头目曾欺骗过广东人民群众，他们提出“先倒蒋后抗日”口号，麻痹群众，实则想利用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去为他们军阀政客的利益跟蒋介石斗争，完全是个假抗日阴谋。同时陈济棠对广州学生救亡运动采取了非常毒辣的手段，以“抗日军训”为名把各大中学校学生禁锢起来，不准上街游行示威，违反者镇压。另一方面从军事上加紧配合江西的“剿”共战争。江穆等便主编出版了秘密刊物《火花》，《火花》第一期是在与江穆有关系的“梅花印刷厂”承印的。第二期则转到西湖街一间小印刷店承印。这个刊物由我负责到印刷店校对和负责部分秘密发行，同时也参加写稿。《火花》揭露了陈济棠反动当局假抗日、真内战的阴谋，并攻击南京蒋介石政府在扼杀了蔡廷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变本

加厉继续实行民族投降政策和反共内战政策。刊物针对上述情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我还写了反对以军事训练来捆缚学生手脚的文章，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日花招。这个刊物出版到第三期（正在装订）就遭到反动当局的追查，陈济棠军阀的“广东省政府公报”上把《火花》列为禁书，并在报纸上明令宣布查禁。江穆隐蔽起来，我则避到东山陈波儿、任泊生家去住了一段，后来因为刊物没注明印刷店名字和编辑地址，文稿用的全是化名，结果反动当局忙乱一阵之后，只能徒呼奈何。

不久，以蒲特（饶彰风）、杜埃为主要编辑的大型文艺秘密刊物《天王星》又出版了。当时刊物都是自费印刷，没有经费，饶彰风想了个办法，向亲友、进步同乡（主要是华侨、侨眷）募捐了一百多块银洋，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大的，便把捐款一部分出了个三十二开本的没有政治色彩的纯文艺刊物《南音》，连刊物的封面也是绿色的，出版后向热心的捐款者奉送，作了交代。而同时暗地里则把大部分捐款出了个大型、赤色封面的左倾刊物《天王星》。内容以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为主，也有文艺评论和批判反动统治的专论。撰稿人有蒲特、楼栖、邝明、蔡雨村等等。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文艺工作者向哪里走？》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走向现实斗争，走向光明。饶除用蒲特笔名之外，还用“文星”、“追光”等等好几个笔名。评论、散文、杂文、诗歌他都写。楼栖除写短篇小说外，还用“寒光”笔名写论文。

记得创刊号我用“赫尔”笔名写了一篇失业工人和罢工工人联合斗争的短篇小说《失业》；第二期用“T. A”笔名写了一个青年在黑夜中找党的小说《光的追求者》。《天王星》出了两期，群众反应颇强，反动当局即已注意。第三期刚出版就被西南军阀查禁了。近年来据查到的敌伪档案称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秘密下令查拿《天王星》杂志的收稿人严蒲特。中大特务为此逐日在学校收发室内守候侦察。三月四日，有学生戴某误取严蒲特信件，被捕送公安局。农学院一姓肖的学生因借《天王星》与戴看过，亦被扣押（以上二人均非《天王星》刊物成员）。

现摘录几份当年伪公安局档案材料。一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广州市思贤分局长林万春复邹鲁函，说学生戴某在中大传达室见到严蒲特信，想检回信箱，被学校督察吴举民发觉，将戴扣留交校务处转解到案；一是三月八日凌伯骥等32人呈请保释戴文；一是四月八日伪公安局函中大注意肖、戴二生言行。

《天王星》事发后，敌人封了梅花印刷社，到处搜捕江穆（因江与几个同乡经营梅花印刷社），江逃去香港，敌人扣押了经售《天王星》的现代书店经理王寄舟。饶彰风在中大比较活跃，有点露头角，因此校中传说他是刊物的主编人，特务紧张追查，饶彰风不能回校，经江穆设法通知饶避到蔡雨村（解放后任省博物馆副馆长，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病亡）所住的地方藏了四天，那时我失学失业，还未进

中大，除少数几个朋友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天王星》编辑、写稿、校对和发行等工作的参加者。但不少同乡知道我和饶的关系密切，因此饶在蔡雨村家藏了四天之后，便要我跟他一起转移到香港九龙去。接着楼栖、邝明、雨村等一批人都撤到九龙深水埗。后来敌人因为抓不到“严蒲特”，而戴、肖二同学又非刊物的成员，结果无法破案，戴、肖二人保释出来，事件渐渐平息。撤退到九龙的一批人又返回广州。饶彰风和我则继续留住九龙，后来饶彰风便去了上海（饶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广东省委统战部长、省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省科委主任、文革前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文革中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惨死于粤北狱中）。而我则回到广州，下半年便和几个进步穷青年考进了中大。

那时以鲁迅为主将的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对广州的一批年青作者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如肖殷、楼栖、华嘉、杜埃、浏心等等，利用“宁粤”矛盾局面，几年来经常发表不满现实的小说、杂文。温流、陈芦荻、黄宁婴、陈残云也经常发表诗作，为新诗歌运动做了工作。

前面说的有关《火花》和《天王星》两个地下刊物，都是在广州左联、社联成立之前，在当年上海左联的巨大推动和那时欧阳山、草明、易巩等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影响之下，由一班左倾青年自发组织出版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左右在何干之领导下成立了“文总”，在

“文总”之下设立了广州左联。我们就参加了广州左联。后来在广州社联、左联领导下，又出版了以革命理论和文艺作品各占一半的秘密刊物《新路线》。这个刊物也是铅印的，伪装成香港威灵顿街印刷出版（详细情况留待后面再谈）。

此外，广州社联还利用公开合法出版过《社会学报》（那时中大社会学系有一门“社会调查”课），主要由江穆、凌伯骥负责编辑和组织调查工作。中大的进步教授何思敬（文革前任职北京人民大学、文革中受林彪“四人邦”迫害致死）、邓初民（现中国民盟副主席）的大力支持，又通过何思敬跟当时广州市社会局长私人关系，得以公开合法在中大社会学系组织了“社会调查团”，我也参加了调查团（我先参加社联、不久又参加左联），我们到过码头搬运工人宿舍、黄包车夫馆、南石头政治犯监狱去作调查。那时区梦觉同志也被关押在南石头，她叫区白霜。社联有个同志还乘机对里面一些认识的政治犯互通了消息。别的调查组还到过陈塘妓院进行调查。

那时广州剧联也进行半公开活动，先后演出过苏联剧作《怒吼吧，中国！》和日本村山知义的《最初欧罗巴之旗》（描写鸦片战争题材话剧）以及抗日活报剧。众所周知，那时蒋介石政府是不准上演反帝题材戏剧的。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夜晚，被一位同志领着，走了几条街，夜色扑朔迷离，来到一个大礼堂，坐满黑压压的人群，气氛严肃，秩序良好，舞台楣顶挂了一条红布横额标语，写着“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接着演出了《怒吼吧，中国！》，突然电灯熄灭了，有人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对日抗战！”的口号，接着散发了传单。顿时群众情绪激动，热血沸腾。这是社联、剧联和抗日剧社所策动的革命行动。剧场周围布置有纠察队，准备着如果特务前来捣乱便与之搏斗。

三、街头行动。这里说的主要是散传单、贴标语。传单一般不当众散发，因为容易出事，除非特殊情况。散发传单方式，有用小绳串好挂着的，有放着的，也有贴上墙的。当时内战惨烈，民族危难深重，传单标语内容多为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政策，要求停止内战，对日实行抗战。有一次，上面发下一叠经过伪装的标语，每条标语上方横写“招租”两个大字，下面就是一条标语。为什么要写“招租”两个大字？因为那时正是世界经济恐慌加剧，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民不聊生，百业凋零。广州随处都有许多空着的楼房没人租住，有单间的，有一层楼的，大都写上“非眷莫问”字样，到处街巷、电灯柱上都有这类红纸招租广告。标语额上写“招租”二字，其作用是假如张贴时碰上有人前来便可转移视线于瞬间，支吾两句就溜掉；其次，既然是招租广告，有人就要看，看了就会传开去。这种方式不可多用，偶尔一二次则可。秘密刊物发行方式：一是邮寄工厂、学校、学生会、图书馆，包括寄给个人的亲戚朋友；二是佯装公开发行，拿到报摊、书店、学校传达室去“寄售”。那时社会上都有寄售书刊惯例。秘密刊物拿去寄售时，对方

不可能马上阅读刊物内容，一般肯接受优惠寄售。寄售的单位不可重复，第二次再拿去寄售，便会发生危险。所谓寄售只是利用公开方式发行，并不希望收回印刷费。因此印刷、邮寄和发行秘密刊物需要一笔经费，都由地下工作者节衣缩食筹得及通过可靠社会关系去募款。那时候直到全中国解放前，地下工作者不但要找职业来掩护工作和解决生活问题，而且还要在经济上帮助组织、帮助党，不象今天一切经费都由国家担负。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广州社联、广州左联领导下的秘密刊物《新路线》出版了，这个刊物是凌伯骥、江穆、穆文彬、楼栖几个人组织出版的，编辑由凌伯骥、江穆负责，编辑机关设在江穆的堂叔开办的常贤旅馆。写稿者有社联的、有左联的人。凌伯骥、江穆、楼栖、杜埃均化名写了文章。凌是社联的骨干之一。前面提到刊物伪装在香港印刷出版，据现在从中大图书馆找到的孤本看，内容是理论和文艺各占一半：有国际形势论文，唯物辩证法论著，理论与实践问题；有苏联人民教育委员会负责人、文艺理论家卢那卡尔斯基逝世消息，以及楼栖、杜埃等人写的文学作品。如散文诗《都市——动乱的天堂》、戏剧《白色恐怖》、小说《袭击》和反对“围剿”红军的长诗《输送卒》。那时候组稿活动非常隐蔽，写的稿子由小组转递上去，谁是编辑，在哪儿印刷，许多人不知道。一九三四年初的一天，小组送来一本铅印刊物让大家传阅，才知道自己化名写的稿子登在里面，这时才晓得刊

名叫《新路线》。这之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文总”被破坏、社联、左联、剧联一些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女子师范和市一中遭到宪警、特务搜查，大逮捕开始了，受株连的学生达六十多人，也被送进监狱。之后，有的判刑，一部分人经过斗争，使敌人迫于社会压力便释放了，一部分查无实据交保放了出来。几个月后，被捕的“文总”负责人谭国标、温盛刚以及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六位同志壮烈牺牲。这是反动派对广州左翼文化运动一次血腥的镇压。何干之于大逮捕前去了上海得以幸免，连贯也撤到香港去，广州社联、左联、剧联停止了活动。

广州左联活动的时间不长，大概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夏前。但广州左联停止活动后，斗争没有停止，新的文艺刊物继续诞生，以后又成立了地下的“突进社”，出版半公开的救亡刊物《突进》和其他许多刊物。地下活动随着反共战争的日益残酷和亡国危机的深重而更加深入、发展。一九三六年十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鲁迅逝世了，象闪耀空际的巨星的陨落，革命的中国人民悲痛万分。冲破重重障碍和克服种种困难，广州的进步文学艺术界和大中学校学生在特务暗中监视下在旧中山大学礼堂（即现今的鲁迅纪念馆内礼堂，这个礼堂是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孙中山演讲新三民主义的旧址）举行了庄严的追悼大会。追悼会变为控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祸国殃民、迫害鲁迅的大会。中大学生救亡会领袖金昌华（抗战爆发后